

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

常建华

摘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带动了明清社会风俗的研究，其中尤以 16 世纪以后社会风气的探讨充分，引出了一系列有关明清社会史的话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明清风俗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从如下六个方面把握，即作为方法的明清风俗论，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全球化与明清风俗论，风俗特性与明清地域研究，职业观与明清风俗论，移风易俗与明清社会变迁。未来的研究，似应在使用“新概念”、挖掘“新史料”、处理“跨世纪”上用力。

关键词：明清 风俗 社会风气 社会史 16 世纪

人们对于—个地方、—段历史、—个群体的认识离不开风俗¹，风俗是我们认识特定时空与社会的窗口。著名学者杨联升指出：“传统的史学家常以风俗之厚薄为时代盛衰的尺度，并非无据。”²就是说探讨风俗也可以了解—个时代。明清时期的风俗变化显着，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十分普遍，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迥异，引人注目，学者多有研究³。明清风俗研究的集中在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形成了—个热潮。可以说，有关明清风俗的研究有力推动了明清社会史的进展⁴。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如何认识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面对时代要求，提出新问题，展示新视野，是明清社会史研究所面临的课题。风俗研究，传统史学家就已重视，如晚近著名学者顾炎武即是，他所著的《日知录》有大量风俗变迁的论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又将明清风俗研究带入新局面⁵，似乎明清风俗研究目前已经成了旧领域。不过我认为，对以往研究课题进行学术总结，还是可以开拓出新课程，在新的学术视野下推动明清社会史研究。故不揣浅陋，写作此文，希望与同好讨论，接受批评建议。

¹ 本文使用的“风俗”—词，除了已有学术成果中直接引用的“社会风气”、“风俗”等有原作者自己的理解外，基本与严昌洪教授“社会风俗”的定义—致，即“—这一概念包括两个部分：—是风俗习惯，—是社会风气。风俗习惯，主要指—个民族（或—定地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包括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好尚、信仰和禁忌。社会风气，则—般是指—定时期社会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言行方面带普遍性的倾向。如生活上追求奢靡，崇尚外观，讲究时髦，就—种社会风气。把社会风气作为社会风俗史研究的对象，乃是因为从风俗形成的过程来看，—时的某—社会风气如果遗传下去，就会变成风俗习惯。同时，从风俗习惯流传的长河中截取的每个—个片断就是那段时间的社会风气。而且，中国历代史书所记风俗常常是包括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的，‘移风易俗’四个字，也包含着转移社会风气这样的内容的。”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7 页。

² 杨联升《朝代间的比赛》，原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65 年 9 月，收入杨联升《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0 页。

³ 关于明清时期风俗的研究，已有若干学术综述，如林丽月《世变与秩序：明代社会风尚相关研究评述》，《明代研究通讯》第 4 期，2001 年 12 月，页 9-19，台北；钞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 年第 10 期，页 9-20；《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9-17。上述综述介绍的为 2001 年特别是 2000 年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研究成果，本文注意尽量反映 21 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新研究，并补充—些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

⁴ 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近况，可以参阅冯尔康先生《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第四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86 页；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4-397 页。

⁵ 通论性的著述主要有：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林永匡、袁立泽《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涉及明清风俗较多的还有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 2003；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6 等。

一、作为方法的明清风俗论

如前所说,风俗可以作为透视社会的窗口。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研究热点是在社会史大论战影响下讨论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明清史被置于封建社会后期或晚期甚至末期的位置,理论前提是这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样的意识下,人们注意到的明代风俗变化,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引起的社会变化,因而风俗变化成为把握明清社会的一个尺度。

现代明史学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大概发轫于明史名家吴晗。1934 年吴晗先生所写两篇论文论述到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问题,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吴晗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奢靡淫荡的生活。”⁶他考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在论述《金瓶梅》的社会背景时,引用万历《博平县志》指出作者截然地把嘉靖中叶前后分成两个时代,又引崇祯《郛城县志》,指出两种地方记载所描写的“市井贩鬻”、“逐末营利”商业发展情形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正是《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进一步使用文集、笔记等数据,认为“在十六世纪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经到达这地步。风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风行草偃,渐渐地浸透了整个社会。”⁷并论述士大夫生活的园亭之盛、饮食衣服求精侈尚、狎优纵博、广蓄声伎等诸多方面。此后吴晗又对明代仕宦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进一步研究⁸。这些论述描绘了晚明社会的整体性图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吴晗从手工业工厂、商业城市的兴起、沿海通商、内地官僚地主经营工商业、时人对社会变化的总结、货币经济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反映七个方面概述,认为:“上述这些问题,是明代以前所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过而不很显着的。当时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正德、嘉靖前后所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⁹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著名社会经济史家傅衣凌出版《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该书《导言》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开始时期,当以明代嘉靖(1522—1566 年)前后,也就是十六世纪为一转折点,而首先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现出来。”¹⁰还就这一时期江南市民经济的发展实质进行探讨,他通过介绍浙江太平、湖北京山风俗变化的资料,前者以明初、宣德正统、成化弘治间、正德以来为几个阶段,说明风俗的变化;后者将成化弘治以前、壬午癸未(即嘉靖元年、二年,1522—1523 年)之间、丙午丁未(即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1546—1547 年)之间作为县之风俗的阶段,说明其一变又一变的情形。指出了风俗变化阶段性的意义:早在嘉靖以前,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即逐渐萌生新的变化,无论在江南或其它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刚露出地面的新东西,颇能反映出破晓前的社会动荡局面。

吴晗、傅衣凌先生将明代风俗变化同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使得传统的风俗论具有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傅衣凌先生焕发了新的学术青春,他强调对明代社会风气的重视。《从中国

⁶ 原载《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 年 1 月,收入《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34 页。

⁷ 该文写于 1934 年 1 月 22 日,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 31 期,1935 年 4 月 19 日,收入《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08 页。

⁸ 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论丛》第 5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又,该文作于 1943 年,1991 年作为遗作才正式发表。

⁹ 吴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作于 1955 年 12 月 6 日,收入吴晗《灯下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 年版,第 106 页。

¹⁰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09 页。又该书初版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一文是傅衣凌的代表性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在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素，这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她的繁荣不是出现于王朝建立的早期，而在其中期以后，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即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¹¹并认为当时封建经济正在变化，于是社会风气也跟着发生变化，上下尊卑观念发生动摇，再如服饰的变化，色服流行于各地，这一个服装的新变化引起道学先生的骇异。社会风气从俭而奢，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反映到思想界里，也出现了一些叛逆思想家，追求科学与民主，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统治它们的制度，并表达他们自己的要求新制度的思想体系。此后又指出：“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与经济的发达，还促使当时的社会习气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无论是从饮食、服饰、住房、用具，以至婚嫁丧葬、游乐社戏等时尚风俗，都产生了显着的变化。”¹²在傅衣凌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辟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¹³他主编的《明史新编》，则将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参照，论述了明初的社会风尚、正统到正德间的社会变迁、嘉靖万历时期剧变的社会风气，成为该书的显着特色。¹⁴

刘志琴是 20 世纪 80 年代较早开展明代风俗研究的学者。她关注晚明商业资本的作用，分析了晚明时期消费生活引发的城市风尚与伦理道德观念变迁¹⁵。陈学文也注意到明代中叶民情风俗及社会意识的变化，¹⁶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和民情风俗的冲击¹⁷。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较早论述明代风俗的变化问题¹⁸。进入 90 年代，研究明清风俗的论文大量出现，牛建强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风尚理论拟构及运用》则是一本专著，从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取向探讨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¹⁹。

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对于明清社会的认识值得注意²⁰。他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主要研究

¹¹傅衣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史学集刊》1982 年第 1 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01 页。

¹²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六章《生产·交换·市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初版，中华书局 2007 年新版，第 334 页。

¹³翦伯赞、郑天挺主编，傅衣凌分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数据·明代分册》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¹⁴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着：《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¹⁵ 刘志琴《商业资本与晚明社会》，《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2 起，第 71-87 页；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1 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页 190-208；收入刘志琴《晚明史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¹⁶ 陈学文《明代中叶民情风尚习俗及一些社会意识的变化》，《驻马店师专学报》（后更名为《天中学刊》）1986 年第 2 期，第 1-14 页；又该文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1990。

¹⁷ 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一书辟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和民情风俗的冲击》部分，内容包括《明中叶民情风俗及社会意识的变化》、《明中叶弃农弃儒从商风习和重商思潮的出现》、《附录：敬所笔记》、《冯应京〈月令广义〉中的经济思想》等文，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¹⁸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 年第 2 期；吴仁安：《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 年第 5 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 年第 12 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 年第 4 期；陈茂山：《试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史学集刊》，一九八九年第 4 期；刘和惠：《论晚明社会风尚》，《安徽史学》1990 年第 3 期，第 23-29 页。

¹⁹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风尚理论拟构及运用》，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又，关于社会变迁问题，可参看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²⁰参见叶坦《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26 期，1998 年 9 月。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注意到经济发展引起的多方面社会变化²¹。此后，吴承明先生的研究转向市场与现代化问题。他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统成果，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十六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进一步证实并发展了傅衣凌先生的论点²²。他探讨了十六、十七世纪我国的经济变迁、社会变迁、思想变迁，同时认为这些现代化因素没能顺利发展，则是因为它没能引起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进入十八世纪，又受到各种“逆流”的冲击，到十九世纪才现起色²³。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也注意联系风俗变化探讨社会变迁问题。该书绪论指出：大量史料表明，明朝前期和后期的社会具有迥然不同的面貌，分水岭即在成、弘年间。成、弘以后，社会显示出明显的变迁迹象，晚明社会变迁的特点也逐步彰显出来。本书中，将明朝历史两分，划定为前后期，以成、弘划线，其前为明前期，其后为明后期；然后将研究范围确定在成、弘以后，重点在嘉、隆、万以至明末，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1450—1644），其间大约200年的时间跨度。著者认为，晚明中国由一个比较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²⁴。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五章 社会风俗的变化也进行了探讨²⁵。

对于明代风俗变化的整体把握，也有其它侧重有所不同的论述，如陈宝良认为：明代社会风俗的变化，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自正德以后，社会风俗出现了一个历史转向，诸如从俭朴转向奢侈，从淳朴转向薄恶，最后出现了风靡全国的流行时尚。明代风俗的演变，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明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²⁶。也有学者指出：“晚明”越来越清晰地被描述成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提到晚明，人们想到的关键词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好货好色、逾礼越制、以情反理、个性解放，以及《金瓶梅》、小品文，等等。这些景象在晚明社会确实很突出，也可以说是晚明与其它时期不同的鲜明特征。提示研究者：“忽略政治、江南以外、乡村的晚明，特别是忽略各种晚明复杂的关系，对认识被作为主导面的人文、江南、城镇的晚明其实也是不利的。”²⁷还有学者提示研究晚明社会变化时应注意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与社会固有的“构造”特质。²⁸晚明社会变迁已经成为学术热点²⁹。

台湾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也较早开展了对于明清风俗的研究。徐泓教授是台湾倡导明清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及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他将明代江、浙地区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三期：初期自洪武至宣德年间，社会风气“俭朴淳厚”、“贵贱有等”；中期自正统至正德年间，淳风如旧，部分地区则因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开始“浑厚之风少衰”；末期自嘉靖以后至明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社会风气已有

²¹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²² 吴承明教授的论文，依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别收入三本论文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

²³ 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载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0-50页。

²⁴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商务印书馆2005；参见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²⁴

²⁵ 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²⁶ 陈宝良《明代社会风俗的历史转向》，《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

²⁷ 刘勇强《构建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²⁸ 郑炳喆《晚明社会：中心与周边，变化与构造》，《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²⁹ 紫蓝《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

转变的地区奢靡之风日甚一日，而大多数原来风气淳朴的地区，也渐趋奢靡，形成“华侈相高”、“僭越违式”的明末风气。奢靡相高的社会风气，冲击了原来“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尊卑、长幼、师生等伦常关系备受挑战，形成“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均可用金钱财富打破”的心态，作者认为，此种要求平等的共同心理倾向，与嘉靖年间王阳明主张良知平等之义相呼应，一为以财富破坏社会等级制度，一为以良知向社会等级制度挑战。他还对商品经济不如江南的华北社会风气进行研究，认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就十六、十七世纪的明代社会经济特色重新概括³⁰。此后，台湾学者有关研究不断出现，我们将在下面的相关部分加以介绍。

日本学者森正夫教授使用“秩序”这一概念研究明代社会。1977年他发表了《关于一六四五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乱》³¹一文，指出由于“衣冠”、“乡绅”、“士大夫”们为顶点的社会秩序中所存在的矛盾导致了乌龙会反乱的发生，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认为不应该忽视既存的社会秩序、社会上诸种关系以及价值观的“古今未有”的变化。1979年他又发表了《关于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根据明末清初地方志中的资料，进一步列举了“秩序颠倒”的具体现象，提出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预测秩序是在“场”表现出的，这个场可以置于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在地域社会，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身份间的秩序外，还有横向关系的共同体³²。此后又加以补充说明³³。秩序的概念在明清史学界影响很大。³⁴岸本美绪在她关于明清之际和江南社会的一系列的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认为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变动所揭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即以尊卑、贵贱、长幼为特征的明朝旧有秩序的解体和清朝政府所主导的新秩序的建立。³⁵岸本美绪强调了从风俗认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³⁶。

在欧美学界，旅美学者张春树、骆雪伦注意到晚明随着以商业经济发达为特征的经济巨变，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显示出“现代性”³⁷。卜正明（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³⁸将明代商业发展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万历《歙志》作者歙县知县张涛，借助一年四季的变化比喻歙县风俗的变化，被卜正民巧妙地借用为全书各章的标题，论述明代社会、历史的变化，即明初是安详静谧的冬季，明中期是喧闹的春季，张涛所处

³⁰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页137—159，按：此文先以〈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为题，发表于韩国汉城大学《东亚文化》，24辑，页83-110；1986年12月；徐泓《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1月版，页107—173；徐泓《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与经济》，《故宫文物月刊》，9:7(1991)，页47-52。

³¹载《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东京：燎原书店，1977年。

³²森正夫《明末の社會關係における秩序の變動について》发表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9，收入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三冊（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45-84。王翔的中文译文《由地方志所见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发表于《琼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³³森正夫《明末における秩序變動再考》，《中国——社会和文化》，第10卷，1995，第135-159页，收於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三冊（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85-120。

³⁴参见伍跃《日本明清史学界关于秩序问题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北京），2006年第2期，页24-28。

³⁵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の秩序問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³⁶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観》，《古代文化》第48卷第2号，京都・1997年2月；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観》载《新史学》13卷3期，2000年，页1-20。

³⁷张春树、骆雪伦着、王湘云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又，该书英文版初刊于1992年。

³⁸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又，该书英文版初刊于1998年。

的时代则是纵乐与困惑交织、疯狂而燥热的夏季，最后一个季节是秋季，一个混乱的季节。其中前面三个季节，也是对应于作者对明朝所作出的前、中、后的时段划分，每一个时段都是从世纪中叶开始的大约一百年时间。勾勒出“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看起来向前发展和不间断的商业扩张的轨迹”。卜正民笔下的文化概念的两个特征：一是文化所具有的知识特性，二是其行为性，即不拘泥于知识性的形而上，也关注生活本身，哪怕是连姓名都无从考证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对士绅产生的影响，是作者讨论的焦点。³⁹

地方志以及笔记文集等数据大量记载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显著变化，学者关注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的明清风俗论说，予以说明。森正夫、岸本美绪的上述研究，反映出日本学者试图从社会秩序变动的风尚来把握明清的时代特征。徐泓的研究则“成功地结合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课题，是相关讨论中最深入而有系统的论述”⁴⁰。吴晗、傅衣凌以来的大陆明清社会风气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特色，从以生产关系到以市场为线索，追寻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化的因素，试图把握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形态在明清时期发生的历史意义的重大社会变迁。实际上明清时期的风俗成为一种“文本”，借助对于明清风气的剖析，以认识明清的社会及其时代。因此，有关社会风气的研究，推动了对于明代的内部分期特别是16世纪前后的社会变迁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对于明清时代总体性的把握。

二、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

明代社会风气变化的特色之一是崇尚奢靡，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就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明代后期，江南城镇市民经济的成长，使城市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于是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已不是单纯的农村淳朴生活，而是争奇斗采。江南俗尚奢靡，拿服饰来说，也已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新的服饰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并向学术界介绍了明代人陆楫对于奢俭问题的看法：禁奢侈不足以使民富，奢侈却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主张“崇奢侈黜俭”，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⁴¹傅先生不仅肯定“崇奢侈黜俭”思想体现商品经济对于意识形态冲击的同时，后来也指出“明中叶以后生产和交换的发达，确实也曾引起社会浪费的加剧，许多工商业者，往往不是把财富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追求奢侈的生活……明清社会这种豪侈放纵、争奇斗艳的生活风气，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商人讲勤俭、谈生产，是完全两样的。”⁴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奢靡之风多有论述，再次涉及了陆楫《禁奢侈辨》的经济思想问题，吴申元、陈学文较早论述了陆楫所宣传奢能致富的高消费思想⁴³。学者对明清时期⁴⁴或分别明⁴⁵、清⁴⁶两代的奢靡之风发表了一批论文，有的则探讨明清时期违礼逾制风

³⁹ 参阅罗艳春所写书评，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436页。

⁴⁰ 邢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导言，“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⁴¹ 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收入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中华书局2007年新版，第317-319页。

⁴²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七《倾斜型的明清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07，第365-366页。

⁴³ 吴申元《明代经济思想家—陆楫》，《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期，第98-99页，95页；吴申元《试论明代中后期经济思想的演变》，《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第44-49页；陈学文《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第27-29页。

⁴⁴ 邱禹《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市民生活中的奢靡之风》，收入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8-272页；王卫平《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四》，《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第56-61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气⁴⁷。钞晓鸿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广义的“奢靡”观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界定：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要，某些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某消费与个人（或部分人）的收入不相称，消费者攀比浮夸、或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业、追求财利，违背伦理纲常与等级秩序。“奢靡”一般被作为负面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批判。其变化表现在：一些超过某事项实用需要与原本不应有的消费活动以及稍许炫耀攀比得到默认、肯定，强调奢侈的经济功能，肯定工商业者的地位及追求财利的合理性。“奢靡”观念的新旧激荡反映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有限性。他还将学术界明清奢靡问题研究归纳为“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波及范围、成因、评价几个问题，足资参考⁴⁸。

明清时期的消费问题受到重视。王家范对明清江南消费行为作了九大类的具体考察，并论证明清江南地区突出的高消费行为。认为它是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使手工业生产奉行的是质量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因此无益于经济结构的突破。奢侈性消费又污染了社会主体力量的心理素质，在他们中间无法造就出一代社会变革者。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强有力地统治着经济。所有奢侈性的高消费无不靠政治力量的支撑，更鼓励着富有者必须攫取政治权力，从而又稳固了传统的政治结构，经济难以取得相对独立的发展。奢侈性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⁴⁹陈学文强调商业、交通、旅游、服务等行业，现代称之为第三产业，其某些职能在中国古代也早已存在，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通过明中叶某些有识之士生产观与消费观的变化，尤其是对发展旅游业兴趣高涨的剖析，指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变。⁵⁰常建华使用“生活性消费”的概念，认为明代衣食住行用消费风俗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具有追逐时髦，竞相奢侈和违礼逾制三个特点。特别指出：嘉靖初年，瓦楞帽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帽子，多富室戴之，到了万历时各地流行，几乎全民普及，甚至连乞丐亦戴，价格也从四、五两跌至一钱至八钱不等，落价六倍至五十倍。瓦楞帽经历了由标新至模仿而普及的时尚形成过程。⁵¹最近的明清奢侈与消费问题的研究有一些新动向，关注到普

⁴⁵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邦建《明代中后期消费奢靡原因探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⁴⁶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来新夏《结网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43-60页。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康乾盛世与奢靡之风》，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86-91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6-110页；《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孙燕京《略论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01-110页；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第135-139页；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李长莉《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105-112页。

⁴⁷张仁善《清代礼制对本朝前期社会生活的影响》，载《南开学报》1990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瑞《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中越礼逾制现象探析》，载《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朱绍华、王翔《“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⁴⁸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页96-117；钞晓鸿《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9-17。

⁴⁹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载《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⁵⁰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⁵¹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第53-63页。

通民众的层面。樊树志提出民间信仰的消费问题,认为江南市镇早在明代中叶以来就出现了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繁荣,早期工业化成就引人注目。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土壤,培育出来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内涵与认识价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以民间信仰为形式的迎神赛会成为民众的狂欢节,化作小传统中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奢侈风尚既是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产物,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官员的“禁奢”主张,以及文人斥为“世风日下”的哀叹,是逆潮流而动的迂腐之见。⁵²此外,宋立中探讨明清江南节日消费,认为这时已初步形成消费品市场,节日经济现象初露端倪。明清江南节日消费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常消费品与节日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有利于形成消费品的规模生产和特色消费品的培育;同时也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和全国市场的整合。⁵³此外,日本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⁵⁴。

旅美华人学者杨联陞教授也很早注意到奢侈浪费与经济成长之间可能的关系,探讨中国历史上奢靡论的特殊意义,并介绍了上海人陆楫论述奢侈的资料⁵⁵。另一位旅美华人学者、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教授,认为陆楫反对“禁奢”的目的则在于“均天下之富”,与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崇奢论境界不同。并就陆楫得崇奢论是否曾引起当时和后世的注意考察,证实陆楫的议论当时便有人欣赏,甚至辗转传述,奢的社会功用在十六世纪被发现以后,一直传衍至18世纪,未曾中断。

56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学者则对于明代陆楫的奢靡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林丽月对明代奢靡问题发表系列论文,她探讨了明代社会的由俭而奢、晚明士人“崇奢”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工赈”观念看晚明“崇奢”思想与经济政策之关系,认为晚明“崇奢”思想质疑官方的禁奢政策,极富时代反省的意味。⁵⁷林丽月特别探讨了陆楫的奢靡论,认为学界使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分法”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它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⁵⁸林教授发现并向学术界介绍了陆楫的文集《兼葭堂稿》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就陆楫论奢侈这段文字在明末清初辗转传抄的关系详加考察,以阐明陆楫《兼葭堂稿》载明清“反禁奢”思想传衍中的地位及其意义⁵⁹。

陈国栋翻译过杨联陞的《侈靡论》一文,对于相关问题早有留意。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

⁵²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

⁵³宋立中《论明清江南节日消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载《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⁵⁴如则松彰文《清代中期奢侈·流行·消费——江南地方中心——》,《东洋学报》80卷第2期,1998年,第31-58页。

⁵⁵杨联陞《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原为英文论文,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第20卷,1957年,陈国栋译成中文,收入杨联陞《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第169~188页;又《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新版,第127-141页。

⁵⁶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收入陈弱水、王泛森主编《思想与学术》,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93页。按,该文原载郝延平等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⁵⁷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1991年6月。

⁵⁸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页131-153。

⁵⁹林丽月《〈兼葭堂稿〉与陆楫“反禁奢”思想之传衍》,载《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1年,页121-134。

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认为陆楫的崇奢观，即是：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⁶⁰他还探讨了明代奢侈风气的相关问题。⁶¹

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些学者对于食衣住行消费事项进行了专门研究。服饰的研究最具活力，林丽月、巫仁恕探讨了明代服饰风尚与社会心态问题。林丽月指出，正德、嘉靖以后明代社会奢风日炽，服饰僭礼违制的现象日趋普遍。官民服饰竞尚华侈，去朴从艳、慕奇好异，蔚为晚明风尚，妇女服饰的僭侈多变尤甚。士庶男女之讲究服饰装扮，更从标榜身分、炫耀财富的“僭礼越分”行为，逐渐演成不断追求“时兴新样”的服饰文化，显现迥异于明代前期的消费心态，而知识阶层感时忧道的“服妖说”亦相应而起。“服妖说”多承袭两汉以来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的思想与论述方式，对晚明日益讲究的服饰文化，自然缺乏针对物质与艺术层面抒发的时代意见。并论述了认同与区分：明初服饰制度的文化意涵，僭越与追信：明代中后期服饰的奢僭与流行，炫耀与品味：从服饰商品化看晚明的消费心态等问题。⁶²巫仁恕指出，明代中期以后相对其它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提升，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却大不如前，在面对其它人争相模仿士人服饰时，遂产生强烈地危机意识。为此士大夫要求中央与地方官重申禁令，并提出“古礼”之名或引用传统的“服妖”说来批评。当两种方式都无法发挥效果时，士大夫只有更积极地自创新风格、新形式的服饰衣冠，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同时也从美学的角度自创“雅、俗”之说，以区别士人服饰的品味与众不同。并就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进行专门论述⁶³。明清时期流行穿皮衣，这一时尚引起学者的注意⁶⁴。

饮食方面，吴智和深入研究了明人饮茶问题⁶⁵。王鸿泰讨论了酒楼茶馆问题⁶⁶。许敏论述明清饮食店铺的兴盛，认为明中叶以后，遍布全国城乡的饮食店铺，在大众消费需求和行业竞争的双重刺激下，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即大小饮食店铺均有意或无意地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在店铺的形态、环境乃至产品包装等方面，营造出一种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现象可称之为饮食店铺文化。市民消费也有了很大变化，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⁶⁷徐林指出晚明士人乐于宴饮既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又是内心苦闷、事功心态弱化的产物⁶⁸。有关饮食专著也涉及

⁶⁰陈国栋：《有关陆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卷2期，1994年6月，页159-179。

⁶¹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第57-69页。

⁶²林丽月《衣裳舆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10卷3期，1999；林丽月《明代中后期的服饰文化及其消费心态》，《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2002。

⁶³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10卷3期，1999；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05。

⁶⁴邱仲麟《保暖、炫耀与权势——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0:4,2009；赖惠敏《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故宫学术季刊》21:1,2003；周湘《清代尚裘之风及其南渐》，《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⁶⁵吴智和《明人饮茶生活文化》，明史研究小组1996年7月初版。

⁶⁶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新史学》第11卷3起，2000年，第1-8页。

⁶⁷许敏《明清饮食店铺文化略论——着重对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考察》，《炎黄文化增刊》第6期；许敏《明清饮食店铺与大众社会生活》，《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⁶⁸徐林《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习俗风尚⁶⁹。

住房方面，黄敬斌关注普通居民的住房消费问题，论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农村和市镇居民的住房的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和结构、室内外环境、卫生状况、室内陈设，并对十八世纪以来江南居民，特别是农民人均住房的数量和面积、家具的数量、以及年均住房消费的开支水平作了尝试性的估计。⁷⁰吴建华也依据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⁷¹巫仁恕还论述了明代士大夫的家具消费文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的盛行，造成对家俱的大量需求，也带动家俱业的发展与家俱的商品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家俱的需求也会不同，士人与文人就塑造完全不同于高官富人的家俱品味，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标志。尤其对于支撑他们文化支配权的重要象征——书房特别重视，他们尝试在书房家俱上铭刻，将之特殊化与神圣化，来抵抗家俱商品化的潮流⁷²。

出行方面，巫仁恕讨论了晚明江南兴盛的旅游活动，还以明代的乘轿风气为例，揭示轿子在政治权力、社会身分或政治文化等三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⁷³。吴智和认为，明人喜好山水之游⁷⁴。周振鹤认为晚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使旅游成为一件正经事，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并蔚为时尚，许多人写下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文章，其中突出者遂成为著名的旅游家，个别超群者则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⁷⁵于宝航认为，晚明时期乘舆制度“崇节俭、辨等威”的制度精神遭到消解，而占有大量资源的权贵集团及其衍生群体是这一变化的根源和主体。⁷⁶

如何评价明代生活方式出现的巨变呢？张春树、骆雪伦认为：“在中国晚明时期，发生了一个几乎是全国范围的消费革命，转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⁷⁷巫仁恕特别是从消费的角度深入理解奢靡现象，提出了晚明消费社会论。他的专著《品味奢华》⁷⁸探讨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从乘轿、服饰、旅游、家具、饮食几方面，探讨消费与权力象征、流行时尚的形成、消费品味与身分区分、物的商品化与特殊化，以及文人品味的演化与延续。作者还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分析万民社会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士、商关系的变化，同时注意到士大夫也透过消费文化，塑造消费品味与流行时尚，来重新建构他们的身份地位。对于巫著提出的晚明出现了“消费社会”的观点，汪荣祖著文商榷。⁷⁹

台湾史学界标举「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议题，形成了一股集体研究风气，将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境界，其中王泛森、李孝悌支持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明清的城市文

⁶⁹ 赵荣光《赵荣光食文化论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1997。

⁷⁰ 黄敬斌《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住房消费》，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1期。

⁷¹ 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⁷² 巫仁恕《晚明文士的消费文化——以家俱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⁷³ 巫仁恕《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第87-143页；巫仁恕《明代士大夫与轿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8期，2002年，第1-69页。

⁷⁴ 吴智和《明人山水休闲生活》，《汉学研究》第20卷第1期，（总第40期），第101-130页，2002年6月。

⁷⁵ 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2005年1期，第72-78页。

⁷⁶ 于宝航《晚明世风变迁的观察角度与解释模式——以乘舆制度为研究中心》，《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⁷⁷ 张春树、骆雪伦著、王湘云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⁷⁸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2007年。

⁷⁹ 汪荣祖《晚明消费革命之迷：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

化与生活」等计划，推动了这类研究，上述有关奢侈与消费问题的研究属于其中的一部分⁸⁰。巫仁恕详细探讨了台湾消费文化研究的现状，概括了四个议题：从明清奢侈风气看当时出现的消费社会现象与特征，探讨消费社会中具有促进消费与刺激生产的重要特征——流行时尚的作用，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分析消费物品所反映的权力象征、社会关系与商品化程度，检视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透过消费寻求或建构身分认同。⁸¹

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经过数十年来的历程，从注意奢靡社会现象，到关注陆楫反禁奢思想，最终提出晚明消费革命、消费社会论，这是一个理论升华的过程，对于晚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不断深化。其中也借鉴了欧美学者对于明清时期社会文化⁸²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理论著作。尽管对于晚明是否为消费社会还存在争议，这一讨论必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的研究。无论如何，晚明社会存在较高水平的消费恐怕是不争的事实。高消费尽管可以受到一定思想观念的支配，但是一般来说消费者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也是基础，这自然要靠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为支撑，明清特别是明代国外白银流入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

三、全球化与明清风俗论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 15 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来人们的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uergen Kocka)最近就全球化下的社会史研究发表看法，他首先回顾说：20 世纪 60—70 年代曾经有过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史的迅速崛起。社会史在今天仍然很强大，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远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与特别)。在 80 年代，日常生活史向渐成经典的社会史挑战。许多年里，人人都在谈论日常生活史。今天很少有人提及此概念，尽管它留下的不仅仅是某些痕迹。然后是 90 年代迅速崛起的文化史，其中有的是随着语言学转折潮流而起，有的是受后现代精神的影响，又有的是以一个未来的包揽一切的垄断学派的姿态出现的。但是，现在它也苍白失色了，人们长久讨论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对立也不那么重要了。他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跨民族的历史观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这一全球化，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在 19 世纪晚期与 20 世纪初加速，但直到最近 15 年内才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作为当代的标志。他以社会史传统的局限性为例说：如研究殖民或者帝国主义时，社会史学者倾向于在进行扩张的社会内部本身寻找解释，而不是主要在跨民族的关联本身或者在国际体系本身中去寻找。在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中许多人从事的社会史研究与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无疑存在着张力。他提醒道：我们在研究社会史时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如“社会”与“阶级”概念，明确地或隐约地是与民族空间相关联的，因为它们是在 19 与 20 世纪形成的，当时民族国家的权力也深刻地影响了对现实的思想构建、提问、分类与分析工具。他还提出研究的方法：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

⁸⁰ 邱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新史学》17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

⁸¹ 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17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

⁸² 如韩格里《中国近世的“品牌”与“商标”：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一种消费主义》《中国社会与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页 190-226；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等。

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它”的专题。于尔根·科卡最后说: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尽管很难,也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在史实上,作为对社会史基本概念的批评;大概也就因果分析而言也能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⁸³

进入21世纪,弗兰克(Frank,G.)《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⁸⁴,彭慕兰(K.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来到中国⁸⁵,引起学界的很大反响,学者更加关注明清史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樊树志指出: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⁸⁶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于《白银资本》与《大分流》中的观点持慎重态度。如李宪堂认为,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⁸⁷

明清史固然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也离不开东亚的角度看问题。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长期致力于东亚贸易圈的研究,近来也考虑东亚与全球化的关系。2005年6月7日,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滨下武志作了“全球化史研究与东亚”的报告,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具体地阐述了他的“全球化中的东亚地域文化”观。认为要从东亚的内部发展变化研究东亚区域史;从海域论地角度来看的东亚论与亚洲现代化论。⁸⁸岸本美绪教授为探索二十一世纪明清史学的新方

⁸³ [德]于尔根·科卡着、景德祥译《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⁸⁴ (德)弗兰克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⁸⁵ 2001年5月20-22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到彭慕兰出席,彭慕兰提交《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的关联》一文,李伯重、史建云进行了评论,该文刊登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全书则由史建云翻译,于200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

⁸⁶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⁸⁷ 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⁸⁸ 滨下武志《全球史与东亚区域研究》,数字中国网“世界历史学综合”栏目。

法，从东亚地区的角度而讨论明清交替及清朝国家性质讨论问题。她指出，十六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亦即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本时期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为“十六世纪问题”。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之中，欧洲、东亚及其它地区都出现了新兴政权。十七世纪以后，这些政权经过各种各样的摸索过程，进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体制。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等本时期所建立的诸国，可以称为“近世（early modern）国家”。这些近世国家超越了地区间的差异，面临着几个共同的课题。亦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作者以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它国家，并且考究明清交替的历史意义以及清朝国家的特征，可以称作“东亚地区论”。将明清史研究置于全球也离不开置于东亚的视野。⁸⁹

在“全球化”视野下，明清史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明清史自然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史中认识。2007年10月27日至30日，由台湾中国明代研究学会与东吴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历史系联合主办“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成社会变迁、地域社会、政治与制度、儒学与士人、财经政策、经济发展、市镇发展、史学与思想、史书与史学、商业商人与法律、士人与世变、军事战争与社会、政治文化、地方史治、文学与史学、文人文化、中外关系、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等专题讨论⁹⁰。这是明史学界对于“全球化”情形下如何开展明清史研究的响应，举办者颇具当代学术眼光。

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⁹¹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恰恰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行为显著⁹²。不能不说，明代社会风俗的显著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

万历时期的社会与风尚已有大量研究，相对来说成化时期的研究较少，近年来方志远等学者意识到研究成化时期的重要性。方志远提出，成化时期“精华与糟粕并存、荒诞和变革共生”，“合理的社会需求常常以荒诞的方式予以表现”，是把成化时期的社会作为历史转型期看待。⁹³有人对于成化弘治时期的奢靡之风加以论述，考察了《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所反映的成弘时期人们在服饰、器用、饮食、婚丧、享乐方式等方面的奢靡表现，认为奢靡之风适应成弘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而兴起，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还给明王朝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反映出成化、弘治时期社会转型及社会变迁。⁹⁴牛建强呼吁加强对于嘉靖朝世风的研究⁹⁵。

⁸⁹ 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⁹⁰ 宋惠中《“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明代研究第十期，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7年12月。

⁹¹ 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载《明史研究》第10期，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7年12月。

⁹²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⁹³ 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⁹⁴ 吴启琳《〈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见成弘时期“奢靡”之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白银流入与明清社会生活的关系，请允许我说一段往事。1980年代后期，冯尔康教授与我写作《清人社会生活》⁹⁶时，我写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内容，其中写到苗族部分，为苗族的服饰多样化所吸引，对苗族无论男女喜欢银器，戴耳环、项圈，妇女各戴手钏，而产生好奇心。2007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听陈春声教授《18世纪的美洲白银与中国社会》的学术演讲，他使用PPT演示，播放的首张图片是一群美丽的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姑娘，她们的白银头饰光彩夺目，陈春声提醒大家这些大量的头饰白银是如何来的，接着他讲了15世纪以来的美洲白银如何流入中国，白银如何配合了中国的赋役改革，又谈了清代改土归流后清水江流域开发木材，运到江南消费，清水江流域苗族积累起大量的白银，与苗族的习俗结合导致银饰的普及，简而言之，这些苗族的银饰来自美洲！真令我茅塞顿开！后来我参观中研院史语所博物馆，当讲解员提醒我注意苗族的漂亮银饰时，我兴奋地向她介绍了陈教授的看法。原来历史这么有趣，证明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句至理名言。社会史的研究脱离不了与经济史的联系⁹⁷，明清史研究离不开世界史，全球化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普遍联系。

白银流入中国，不仅要关注美洲白银。清代中俄的陆路贸易也很值得重视。台湾学者赖惠敏研究清代内务府商人的活动，探讨了清代崇尚风气皮毛与内务府皮毛贸易活动的关系。她还利用清宫的档案，探讨乾隆皇帝个人的喜好，影响苏州的社会文化发展。指出乾隆皇帝以苏州织造局为中心，成做各种刺绣、玉器、铜器，以及无数的古玩。Evelyn S. Rawski认为，清初颁布有关发式、服饰、语言和战术的法令，以界定征服菁英之独特认同。作者透过织造局成做象征满族配饰的班指、荷包、撒袋，可知乾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精神。⁹⁸这令我们联想到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的说法：“清朝没有继承明朝以农业为本的基本政策，而采用依靠商业资本的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经历入关以前东北的交换经济而受过白银的洗礼。”还有岩井茂树关于明末北边社会论文的结论：“十六、十七世纪辽东的满洲国家的出现是，除非这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边境人的政治性集结的结果。而由于代表边境人利益的这个国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所以长城和边墙这些境界被废除，曾为时代焦点的边境的暴力问题也得以解决。这些事情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些情况，白银或人口、物品流动激烈的动荡时代才能够成功地步入稳定轨道。”⁹⁹看来清朝国家的具有突出的商业性质。

其实关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产生的效应，早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到，吴晗、傅衣凌特别是傅先生，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导言中，首先论述白银使用与赋役的改革，接着讨论国内商品流通的频繁，是把商品流通的频繁作为白银使用的后果看待的。后来他也指出：“中国白银使用虽早，但财政意义重过交换的作用，就明代而言，白银多用于粮草

⁹⁵牛建强《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

⁹⁶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⁹⁷可以参看中山大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如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影印本1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水江文书》收集了近5200件文书，内容涉及林业生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是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特别是西南林业发展的资料。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聚居区，大约有30万件文书收藏于民间。

⁹⁸赖惠敏《从高朴案看乾隆朝的内务府与商人》，载《新史学》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页71-133；赖惠敏《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载《故宫学术季刊》第21卷第1期，2003年，页101-134，该文又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赖惠敏《寡人好货：乾隆帝与姑苏繁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第453-483页。

⁹⁹上述三田村泰助、岩井茂树的看法，均转引自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的折色，田赋的加派，商税的征收，盐课的纳价，相对上说用于民间的交换则较少。”¹⁰⁰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岸本美绪给出了一个回答：“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与女真，派出大量的军队驻扎于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军费，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从二百万两增至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额。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越不足，纳税越困难。即使进口的白银通过交易而迅速地流入全国各地，当时的政府大力地从全国各地吸收税银而投向北方边境，因此内地农村的白银不足难以解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¹⁰¹相应的问题是，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货币社会学认为，货币与社会结构、文化发展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关联¹⁰²，这样的思路，或许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四、风俗特性与明清地域研究

历史研究无疑需要空间的层次，地域社会史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不同地域的风俗是透视当地社会的窗口，明清风俗的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到风俗的地区性问题。由于明清风俗讨论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出现的，所以特别关注江南地区。傅衣凌先生有关风俗的论述集中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就是说明，当然，他的研究广泛涉及到各地风俗资料。

徐泓先生倡导明清社会风气研究，一开始就注重风气的地区性，分别探讨了江浙与华北。最近他又研究了福建的社会风气。徐泓先生指出：近二十年来，史学界对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变迁的研究成果颇丰，可惜多集中于江南社会，对经济繁荣的华南地区鲜少触及。他以方志中的资料为主，研究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比较其与江南、华北社会变迁的异同，以显其特色。徐先生认为：明代前期，社会经济虽有恢复，但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太高，对社会不能造成什么冲击。与江南社会不同，福建社会的风气变迁，很难分出一个洪武至宣德的前期、正统至正德的中期。福建全省，不论沿海与内地，社会风气无大变动，均一如明初之风俗，俭朴醇厚，贵贱有等，是一个“俗安朴素”的社会。明代中期，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消费水平相应提高，社会风气因此日渐“由俭入奢”，但大多数地区，还是“俗安朴素”，贵贱有等的社会。明代后期，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社会经济较快速、全面的提升。在沿海和内地城镇，掀起一片社会变迁的风潮，“风俗之靡，海内皆是”，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然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¹⁰³

徐先生还研究了清代中期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他指出：福建受明情之际的动乱遇海禁、迁海的打击，伴随明代后期以来的繁荣经济而产生的奢靡社会风气遂大为改变，“由奢入俭，由华返朴”。康熙收复台湾后，沿海展界、复界与开海禁，农工商贸易得以复苏发展，无论沿海或内地社会开始转变。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竞相华奢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从康熙后期到鸦片战争以前，奢靡社会风气“风华再现”。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部分

¹⁰⁰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轮明清时代》，中华书局2007，第206页。

¹⁰¹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¹⁰²欧阳彬《货币社会学：历史、理论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70-73页。

¹⁰³徐泓《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东吴历史学报》，第15期，2006年6月，页145-171；该文又载于《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页34-44。

内地山区和部分沿海的府县，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偏远内地甚至沿海部分社会仍维持着明清之际的“俗安朴素”。福建社会在清中期的奢靡风气，时间上比较不如晚明，空间上比较则远不如江南。

104

邱仲麟是较早开展社会风气研究的台湾学者，关注北京地区。他从朝廷的禁例考察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过程。从服饰、舆马、屋宇等多方面论述了礼制的松弛，又从礼俗的变异、社会关系的转移探讨了价值观的改变。认为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有两个层面：一是上下阶层界限的较为模糊，二是社会风气趋于奢侈。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或可能是一种反礼制的过程。

105

大陆学者的研究较为集中在江浙地区。吴仁安就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业资本和社会风尚以及体现其时代风貌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了探讨。¹⁰⁶王卫平指出，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主流是读书求仕，但重商拜金等思潮也风行起来，使人们思想和生活开始偏离封建礼教的轨道，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并对江南社会风气与社会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¹⁰⁷江南地区的葬俗引人注目，最近冯贤亮、张传勇结合生态对于葬俗的研究颇具新意，冯贤亮指出，明清时期，江南的丧葬呈现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极力于侈靡之风；二是有悖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火葬、浮屠及其间滋生的阻葬等恶习盛行。坟茔义冢的存续和意义就在于对于后者的抑制作用，在官绅提倡土葬的理论中纳入了卫生意识。张传勇认为，江南地区水浅土薄的自然地理环境，给人们的营葬提出挑战。为了避免水泉之湿，虫蚁之患，人们从选择葬地、浅土葬埋、灰隔葬法以及葬后培土等方面着手应对，实践证明，综合运用这些葬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自然环境带来的不利因素，达到固护棺骸的目的。反映了区域丧葬习俗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重要关系。¹⁰⁸此外，通论丧葬问题的还有台湾学者何淑宜的出色研究¹⁰⁹。牛建强探讨了市镇经济、商品农业、工商业、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态，认为江南早期社会变化与该区中后期变化有密切联系。¹¹⁰刘同彪、蔡克骄认为：由于社会结构及人们心态的变化，明中后期温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俗偏离现象。他们从民俗偏离的角度来理解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社会风尚的变迁。¹¹¹

徽州习俗研究方面。王振忠利用《目录十六条》，具体揭示日用类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情境，以了解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集体心态。他还别开生面地探讨了瘟疫、灾荒与民俗，重视乡土习俗及民间文化，是其徽州研究的重要特色¹¹²。有人探讨明中后期到

¹⁰⁴徐泓《风华再现：清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2期，2006年10月，页37-70。

¹⁰⁵邱仲麟《从禁例屡申看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过程》，载《淡江史学》第4期，1992年，第67-88页；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第28-42页。

¹⁰⁶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¹⁰⁷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王卫平《吴文化：江南社会研究》第三编收录了有关奢侈风气、重商思潮、赌博风气、逼醮抢醮、停棺不葬以及削鼻班、枪匪7篇论文，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

¹⁰⁸冯贤亮《坟茔义冢：明清江南的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1-184页；张传勇《因土成俗：明清江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葬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8-283页。

¹⁰⁹何淑宜《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的关系：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台北：台湾师大史研所，2000。

¹¹⁰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¹¹¹刘同彪、蔡克骄《论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的民俗偏离现象》，《温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¹¹²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王振忠《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乾嘉时期徽州奢靡之风，认为其形成是徽州的商人直接导致的后果。¹¹³

福建也有人论述。赵建群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福建地区与江南等地一样，也流行起奢侈性消费风尚。不过，见之于明清福建地区的奢侈性消费风尚，是在与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社会俗尚等诸因素互动中生成的，因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其表现又具有地域性特征，具体言之，即是沿海及内地山区诸府民间，既普遍讲求服饰饮食，同时又热衷排场铺张。¹¹⁴王日根 张宗魁指出，明清时期是福建海洋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政府积极加强对福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的时期。莅闽官员多来自内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为政方面则体现出改造海洋社会文化、纳福建于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倾向。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儒家文化与当地海洋文化的交融和协调。陈盛韶的《问俗录》提供了一个认识内陆官员为官于闽的一种轨迹的个案。¹¹⁵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省份也有一些论文讨论。如河南，王兴亚指出，明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的繁荣，市场上提供给人们的生活消费品的品种及其数量增多，社会风尚也“日以侈靡相高”，这一变化从明中叶开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尤为显著，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商品经济发展虽不如江南发达地区，可社会风尚也在由俭朴向奢侈转化。¹¹⁶再如山西，张正明分析了地方志等数据的记载，认为新民风的形成对旧礼教的冲击、新的民主启蒙思想的酝酿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标志着旧的封建经济、文化结构开始动摇。¹¹⁷殷俊玲论述了清代晋中风气，认为奢风甚炽，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这一风尚的形成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又进一步驱人于商途，促进了晋中社会区域性商业繁荣和区域商帮——晋商的发展，从而使清代晋中奢靡之风愈演愈烈。¹¹⁸又如陕西，张晓虹将陕西民俗划分出相同的三个区，分区论述了当时民俗的主要特点。认为由于地区间的商品交流，自明代中期起，在落后偏僻的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率先兴起，除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外，也冲击了社会风尚。¹¹⁹

陈业新探讨了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下的社会风习。他认为：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民间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者主要论述了重农与安愚、懒惰之习，博饮、健讼之风，尚武、好斗风习。¹²⁰

明清时期不少地区健讼成风，值得研究。方志远研究了以江西为主的华中地区健讼问题，认为明清时期不仅诉讼已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之事，一些社会关系复杂、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讼风”更成了令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江西、湖广即今日之湘鄂赣地区尤为典型。¹²¹徽州民间诉讼风气引人注目。卞利就此加以论述，认为明代中后期徽州民俗健讼表现在土地山场、风水坟地、

¹¹³汪志娟《论明中后期到干嘉时期徽州的奢靡之风》，《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¹¹⁴赵建群，《试述明清福建地区奢侈性消费风尚的地域性表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15-120页。

¹¹⁵王日根 张宗魁《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¹¹⁶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¹¹⁷张正明《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

¹¹⁸殷俊玲《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5-85页。

¹¹⁹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俗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¹²⁰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373页。

¹²¹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文史》2004年第三辑，页107—134，此文之前方志远还发表《明代吉安诉讼》，（《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研究专辑”）等文。

塘竭水利、婚姻继承以及主佃、主仆等方面。处理争讼一般是先由宗族，再由“文会”，再不能决则讼于官。由于健讼之风的盛行，徽州人逐步树立和增强了契约观念。还认为徽州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导致健讼的形成。¹²²中岛乐章分析了明代审判程序的一般特点，着重分析了明代中期对诉讼案的验勘、调查、调解、拘唤等过程中老人和里长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¹²³健讼之风与讼师的作为密切相关，川胜守、夫马进等学者对与讼师群体有很好的研究¹²⁴。健讼之风也关系到明清时期的诉讼制度，需要将制度与风俗联系起来考察，涉及法制社会史与法制文化史¹²⁵，透过风俗看社会文化，值得提倡。

民间信仰的研究很有进展。滨岛敦俊对于江南城隍、总管研究引人注目¹²⁶，赵世瑜、朱小田研究了华北、江南的庙会¹²⁷，朱海滨研究了浙江民间信仰¹²⁸，新的研究体现出具有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特色¹²⁹。

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近来出现小区域化与个案研究的趋势，这是研究深化的表现。不同地域的风俗声称原因有其差异，虽然风气的表现往往是地方各方面作用力综合的反映，不过分析其中的主导因素也很重要。明清时期一些地方生态变迁与开发活动值得注意。滨岛敦俊教授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表明，明中叶这里地湿地带的开发完成（分圩过程），于是人们投资土地，农业经营不一定带来利益的经营地主层，便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该地域社会出现了各种变化。¹³⁰这种地域开发的研究视角就值得借鉴，或许存在着开发型地域模式。

五、职业观与明清风俗论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普遍重视阶级与等级身份的探讨，多从经济与法制入手，事实上，社会的主体是依据职业构成的士农工商，当然职业结构的认识离不开阶级与等级身份的分析。一般说明清社会构成的研究中最充分的是农民部分，不过商人与士大夫的探讨后来居上，提出诸多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重视士农工商的关系以及整体性，职业构成与职业观成为讨论对象，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风俗也成为研究的入手处。

傅衣凌先生长期进行明清时代特性与商人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的余论《尾声》部分，提出了值得今后继续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是绅权，二是商与儒、农

¹²²卞利《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江淮论坛》1993 年第 5 期；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议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明史研究》1993 年第 3 辑。

¹²³中岛乐章《〈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代的诉讼处理程序》，《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¹²⁴川胜守《明末清初的讼师》，《东洋史论集》第 9 卷，1981；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范愉、王亚新（译），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页 392—394；邱澎生：《以法为名：明清讼师与幕友对法律秩序的冲击》，《新史学》第 15 卷第 4 期，2004 年，第 93-148 页；林干：《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清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

¹²⁵邓建鹏《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矛盾解析》，《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页 176—200；邓建鹏《清代健讼社会与民事证据规则》，《中外法学》2006 年第 5 期。

¹²⁶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的商业化农村信仰的质变》，收入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

¹²⁷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2。

¹²⁸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¹²⁹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有关研究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与回顾》，《新史学》第 8 卷第 2 期，1997；王健《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 期。

¹³⁰滨岛敦俊《关于明中期的“江南商人”》，《史册》20，1986；滨岛敦俊《明代水利技术和江南社会的改观》，《生活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体系世界史的问题 2》，岩波书店，1990）等。

等不分，三是儒家思想等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三个问题当中，与我们这里的讨论关系密切的实第二、三两个。在第二个问题中，傅先生说：“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还是男耕女织为中心的，这就先天地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怪异的现象，即是商而好儒、儒而兼贾、儒贾不分。在人口构成中，农商不分、农工不分相当普遍……以上种种现象，不仅影响城市的人口构成、阶级分化、工商业者的封建依附性，也影响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相互依存，城乡不分。”¹³¹傅先生在第三个问题中则指出：传统中国以农立国、鄙视工商，社会各阶层——士农工商等秩俨然。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尤为显着，从而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明清两代工商业者的社会自觉正在不断增长，许多商人以及商人世家的人，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而大力疾呼，甚至把为商之道与封建伦理道德、天道相提并论。商人观念的变化，构成了当时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者也善于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吸取优秀的成分，来指导自己的事业。如明清商人伦理中，普遍提倡“贾道”、“贾义”，力图使自己的工商活动，与社会道德相吻合。虽然明清儒贾兼业、农贾兼业、甚至官绅兼贾现象日益增多，但是人们的最终目标乃是科举入宦，买田置宅。明清文献中，有关商人的传记固然有许多，但是他们之所以被文人儒者记载而流传下来，似乎不是他们的工商业行为，而大多是他们从事工商业之后的行为，符合儒家思想，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而值得时人的留念。总之，以上第二、三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傅先生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明清士农工商特别是商人的职业观、儒家思想作用、商人伦理¹³²、商人传记文本等问题，不仅有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儒家文化与商人关系这样的社会与思想关系的问题。

明清时期商人的研究中，徽州商人研究最早，也因资料众多，研究最为深入。关于徽商儒贾关系问题，张海鹏、唐力行很好地讨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问题，并将整理的有关资料公布于世。¹³³唐力行后来对徽州商人进行了全面论述¹³⁴。陈大康论述了明代商人与世风的关系¹³⁵。

对于明清新职业观与商人精神研究开辟新境界的是余英时教授。余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关心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与韦伯《中国宗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观点商榷，余著的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中，论述了一下5个问题：明清儒家的“治生”论，新四民论——士商关系的变化，商人与儒学，商人的伦理、“贾道”。结语指出：“本篇关于十六——十八世纪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使我们看到这三百年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看，商人的‘睦婣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商人社会功能的日益重要也反映在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上。清代政府不但对商人的控制已较为放松，而且态度上也较为尊重。……士大夫对商人的改容相向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变化。”¹³⁶余英时将思

¹³¹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第383-385页。又，据作者后记说，该文为1981年为厦门大学开设课程的讲稿，中间曾征求过国内外同行的意见，1982年在日本讲学使用过，原订于1983年定稿问世，后因患病停置，1987年定稿。

¹³² 早在《明代徽州商人》一文中，傅先生就提出“徽人的商业道德”问题，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页。傅先生意在说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伦理和经营方式是徽州及其它地方商人集团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第387页。

¹³³ 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并与唐力行、王世华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七章《徽商与学术文化》有“贾而好儒”、“徽商子弟的业儒于仕进”两节，黄山书社，1985年。

¹³⁴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¹³⁵ 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¹³⁶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4-575页。

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强调明清职业变动的思想史意义。他指出:“明清作者所谓‘四民部分’、‘四民相混’,主要都是讲士与商的关系。明清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分合上面。”¹³⁷此后,余英时又发表了续作《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¹³⁸一文,主张研究“明清时期的内在渐变”,重点论述士商互动与价值观念的调整,具体包括士商合流及其途径、从‘润笔’的演变看儒家辞受标准的修改、商人‘自足’世界的呈现三个问题。他指出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只有把宗教变动也当作社会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明儒学转向的历史意义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理解。这种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打成一片的方法值得重视。余先生的上述研究影响甚大,也有与他讨论的论文,赵国洪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¹³⁹

明清时代对于工商的认识,以及四民职业结构的变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受到人们高度评价,有学者指出应当具体分析,不更过分拔高¹⁴⁰。我也论述过明清职业结构的变化与工商业者,看到从事工商业者的增多,造成了职业构成比重的变化。并就宗族的职业选择论述,指出众多宗族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成为四民之一,禁止做游民。¹⁴¹明清时期的重商思潮引起注意¹⁴²,有关士商关系出现一批成果,专书如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有专章述论¹⁴³,至于论文更多¹⁴⁴。许敏使用《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新数据,探讨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认为士商合流,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要真正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那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¹⁴⁵此后。许敏又在《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¹⁴⁶长文中,论述社会商业思潮变迁及其对社会之影响,讨论了如下问题: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对商人地位的新估价:商高于工农,甚或不逊于士;新商业、商人思想、理念对晚明社会之影响。近代史学者对于士农工商职业结构变动特别是绅商结构的也进行了研究

¹³⁷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8页。

¹³⁸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收入陈弱水、王泛森主编《思想与学术》,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211页。按,该文原载郝延平等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¹³⁹赵国洪《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5期,第223-230页。

¹⁴⁰林丽月《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载《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近代史所1984年版;冯尔康《关于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载《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

¹⁴¹常建华《明清时期的等级结构》收入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2-605页;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3-455页。

¹⁴²如商传《晚明文化商品化与社会纵欲思潮》,《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重商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安介生《清代山西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27-34页;胡中生《明清徽州商业观的兴起及其局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¹⁴³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¹⁴⁴如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04期,页130~139;刘晓东《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¹⁴⁵许敏《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¹⁴⁶发表于国家清史编委会网站“中华文史网”。其中部分内容以《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发表于《江海学刊》(南京)2002年第1期,第134~141页。

也有学者侧重明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书两部,从话语与心态的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前书在明清之际士人话题研究方面,论述了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和关于“言论”的言论。还对明遗民进行了研究。后书分明清之际文化现象研究和明清之际士人话题研究两大部分,内容涉及谈兵、游走与播迁、师道与师门、君主、文质、井田、封建等,其中所论“士风”与明清风俗研究关系最为密切,颇具启发性。¹⁴⁸以往的士大夫的研究重在仕宦阶级上层,而对其儒学生员下层缺乏系统的论述,陈宝良则出版专著弥补了这一不足¹⁴⁹。他特别从衣食住行、社交礼仪以及文化生活诸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进行梳理,认为生员层的生活既是仕宦阶层生活的一部分,却又与仕宦上层的生活有别;明代生员层的生活在前后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¹⁵⁰。高翔《近代的初曙》以18世纪中国知识界的观念变迁为中心,对18世纪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士林风气、学术动向和政治状况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认为18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潮与士林风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价值多元化,是一个充满着知识的灵光,洋溢着创新精神的繁荣的时代。¹⁵¹徐茂明专门讨论了江南的士绅与地方社会¹⁵²。

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提出晚明“文化分层”问题,关系到对于当时社会结构的认识,指出:“晚明社会的多元化,表现在社会分化上,即社会阶层的变化,不再只是统治和被统治这样的单向度关系,而呈现为多层结构,多种新型社会阶层或称之为新型群体。阶层或群体文化随之而生,明代文化的层次划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一、官僚贵族文化,以台阁官僚和贵族为代表;二、文人士大夫文化,以郎署官员和布衣文人为代表;三、平民文化,以市井阶层为代表。这只是三个抽象的概念层次,其实还可以再分,如文人士大夫文化就可以再分,以功名身份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郎署文化、山人文化,若依《四库全书总目》的分法,还有与山人文化相对应的讲学文化。市井文化中商人与市井细民当然也有差异。”¹⁵³

把文学、思想和社会结合起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探讨“文学与社会”,也是张春树、骆雪伦的学术追求,他们通过对李渔的生活、思想、文学和事业的微观考察,宏观地展示了李渔所处时代的巨变¹⁵⁴。

王鸿泰以士人或文人为主的明清社会研究另辟蹊径。早在求学期间,就出版了研究《三言二拍》观念的硕士论文¹⁵⁵,博士论文《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开宗明义,说:

“什么是社会?”或者“社会生活如何构成?”这是本论文试图探索的根本问题。

¹⁴⁷ 重要成果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另可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8期,1998年9月。

¹⁴⁸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赵园《“晚明”与“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¹⁴⁹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¹⁵⁰ 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之真面目》,《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61-165页。

¹⁵¹ 高翔《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¹⁵²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¹⁵³ 张德建《晚明研究中的学科跨越与学科本位》,《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¹⁵⁴ 张春树、骆雪伦著、王湘云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¹⁵⁵ 王鸿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

唐中期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除了主要的农村形态外，商业城市也在发展中。明中期以后，城市更成为重要的文化发展场域，而中国文化也由此开出新局。本文即选择由商业活动达到高峰，而城市生活也随之臻于极度丰富的明末清初时期切入，试图对此期间内商业城市中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考察，希望由此突破中国社会乃“封闭”、“停滞”之僵固印象，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

本论文主要以商业性城市为对象，针对这些商业城市的“流动”与“互动”现象进行考察。

.....

本论文之要旨为：探究在“流动”基础上的“互动”如何重新凝结、构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社会与文化。

.....

本论文最终的主旨，乃试图建立一个“城市社会”的概念，所谓“城市社会”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公众场域”的构成，而所谓“公众场域”则可定义为：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生活领域上的“交集”，这种交集展现在空间上是“公众生活空间”的开展，在人际关系上是经由社会关系的创造后，所出现的自主性社会团体的凝结，在信息方面是大众传播媒体中介下“想象的社会”的构成，而表现在物质层面上则是：个人的感官欲望可以整合为市场中的商品，而个人生活表现与市场商品样式交相作用，以致形成“流行文化”。¹⁵⁶

全文分5章论述了城市中的开放空间，社交生活与社会身分，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信息网络与公众社会，“物”欲横“流”——商品消费与流行文化。作者透过城市生活现象深入分析了城市社会，而士人则是城市生活的活跃群体。

此后，作者发表了有关士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如他认为，明清部分读书人，在习诗过程中，偏离科举正途，走向另一条人生路径：以文艺写作为人生职志，因而成为“文人”。他们大多以诗歌写作为他们生命活动的重心，诗艺的讲究和创作是文人的自我实践之道，这是他们情感的寄托，也是他们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维系关键。诗之所以吸引士人投入其中，还有其它外在因素。诗其实具有很强的“社交性”，透过诗歌的写作、流通、传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引发共鸣，进而发展出极为繁复的社交活动，营结出密实的人际网络，凝聚对文艺写作有兴趣的文人，开展相关的艺文活动，由此在现实社会中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文艺社会”。在此“文艺社会”中，士人可藉以建立他们的身分认同，以至于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叛应试教育的读书人就在这一社会与文化中建构自己的社会位置、生命意义与精神家园，从而体会应试教育体制下走出来的人无法体会到的自由与乐趣。¹⁵⁷他又指出，明清「尚侠」文化的风行，实可视为城市文化与科举压力，内外交会，因缘相结的结果。明清商业城市的发达，推动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又鼓动尚侠之风的兴起，尚侠之风的兴盛又再激发“侠”之意涵的扩充。城市的发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则是“侠”之概念的新土。作者以明清的士人为对象，探究他们的生命活动，如何营造出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他们如何在此社会文化中，寻求、营造其自我表现空间，藉此以安身立命，确认其个人之生命价值与意义。“轻财结客”之豪侠作为乃突破科举所笼罩之现实世界，别创出一个社会活动场域。在此场域中，侠乃成为有异于科举功名的

¹⁵⁶ 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参见王鸿泰，〈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¹⁵⁷ 王鸿泰《迷路的诗——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2005.12。

社会价值，而侠游乃成为一种别出于科举的人生选择。¹⁵⁸他还对文人文化的特色作了全面而具有理论意涵的分析，认为明清文人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建基于一套将世俗价值扫落于后的“闲隐理念”。但重要的是，要实践这一套闲隐的理念，文人士大夫不但不能无为地坐任文化自动开展，反而要孜孜矻矻地努力建构。在此提出了生活经营的概念。¹⁵⁹他还认为，赏玩文化自明代中叶出现走出艺术“世族门第”，由此清高境界转入世俗世界，在士商相杂的社会格局下，别具意义地重新展开雅俗的辩证，这种辩证的过程具体体现在赏玩文化的流行和反流行的过程中。¹⁶⁰他还对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赏等问题论述。¹⁶¹上述论文论述的是明清城市生活中士人习诗、尚侠、品赏并经营生活，交织着士商关系，形成了如作者提出的反映文人圈子的“文人社会”或“文艺社会”，至于是否存在这样的社会，很有讨论的必要。

诚如王鸿泰所揭示的“文艺社会”、“社会流动性”发生的舞台是城市，明清风俗变化最剧烈的是在城市。张春树、骆雪伦指出，“中国晚明时期经历了高度的都市化（约 25%），城市在 17 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一个极具生机、很有影响的角色。”新兴城市的特质“标志着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模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从李渔的小说和戏曲中，人们可以看到城市生活这样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是文化变化的中心。”¹⁶²

这里也有必要介绍卜正民提出的“士绅社会”论。他认为，在从 16 至 17 世纪的晚明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参与到地方活动，如向地方佛教寺院捐赠等行为，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士绅社会”。这个士绅社会既有着强烈的与国家分离的倾向，却又始终无法彻底地与之分离，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¹⁶³后来，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进一步将“士绅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让渡追溯到了明朝中叶，而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对士绅产生的影响，也成为作者新着中讨论的焦点。

总之，明清时期士绅与商人活跃，二者的互动加剧，士农工商的职业观与社会构成发生变化，“士绅社会”、“文人社会”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明一些社会现象与时代风气，能否深刻揭示这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六、移风易俗与明清社会变迁

明清时期风俗时尚变化较大，士大夫以及国家也不是坐视不管，他们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措施，风俗与士大夫及国家之间的交互动关系，重新塑造了社会面貌。

明朝政府对于奢靡社会风气进行了整饬，林丽月以明代有关“服舍违式”的禁奢令为核心，分别考察了洪武朝禁奢礼制的内容与主要目的、洪武以后各朝奢僭禁令，认为明初的禁奢令尤有

¹⁵⁸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收入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¹⁵⁹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故宫学术季刊》，22 卷 1 期，2004.9；王鸿泰《明清士人的闲隐理念与生活情境的经营》，《故宫学术季刊》，24 卷 3 期，2007 春季。

¹⁶⁰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错杂》，《新史学》，7 卷 4 期，2006.12，第 73-141 页。

¹⁶¹王鸿泰《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赏与美人意象的塑造》，《中国史学》（京都），16 期，2006.12。

¹⁶²张春树、骆雪伦着、王湘云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3、214 页。

¹⁶³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该书系卜正民在哈佛大学师从孔飞力教授撰写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正式出版于 1993 年。又，赵旭东《为权力祈祷什么？——评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页次 187-189）认为，该书是以实际的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两元区分的欧美政治学模式的典范性研究。

革除元俗、用夏变夷的开新意义，正统年间确是明代社会风俗转变的关键时期，到成化、弘治年间禁约颁布更加频繁，显示礼制破坏与朝廷君臣忧心的程度与日俱增。万历末年奢风极盛，禁奢令少于弘治朝，则反映出万历朝政的废弛。¹⁶⁴陈宝良指出，晚明出现了许多新的名词，反映了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从这些新名词中，同样可以发现当时风尚的特点及其新动向。如“苏州样，广州匠”、“时玩”、“杭州风”新名词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反映。这种新生活可以概括为七点，就是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奕、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其中既有大众百姓逗闷的乐子，也有文人士大夫打发闲暇的雅趣。说白了，就是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他还对晚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诸如人心趋于不足、机械变诈，生活趋于享乐化，商业对社会交际的冲击，夜生活在城镇的广泛出现等等综合考察，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对当时的礼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商业化与世俗化，甚至出现了生活的流行时尚。他还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个方面，探讨了明朝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明人为改善风俗所采取的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认为自明代中期以后原本朝廷用来规范人们行为或改善风俗的政策、措施，无不流于形式，同时在风俗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诸如在礼、俗关系上倡导礼因俗制或将礼简单化。¹⁶⁵邱仲麟、吴启琳的研究提到明朝移风易俗问题。¹⁶⁶前述探讨明清时期违礼逾制风气的论文，对此也有所涉及。

在聚族而居地区，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的移风易俗借助宗族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展开了习俗与教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导致宗族组织化。我们先看宗族势力强盛的徽州，徽州在16世纪初风俗出现较大变化，我在阅读明正德四年（1509）《新安毕氏族谱》时，发现该谱收录一篇族训性质的文章《陈俗》，洋洋万言，述说这个主要居住在徽州的休宁、歙县一带的宗族近几十年的习俗变化。其习俗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家庭伦理、宗族观念有所转变，尊卑长幼关系礼仪已不规范，官吏士民不再安分守己，婚丧祭礼渐失淳朴，立嗣继承祖先的神圣性淡化，特别是子弟的日常生活开始沾染奢华的时尚。习俗变化的核心是个性与现实利益的显现，礼俗体现的家族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动摇。这种习俗变化仅仅是萌芽与沾染，还远不是习俗迥异往昔的大变，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商品与市场经济的作用发生的。《陈俗》的出现以及收入族谱是应对习俗变化的对策，起着族训的作用，用以教育族人，可以视为族规的前奏，反映了一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另外休宁范氏的事例表明，该宗族形成的历史，在宋元时代已经显示出来，主要活动有修谱、维护祖先墓地与墓祭。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徽州宗族由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进一步深入基层社会，在绅士的倡导下，掀起了宗族建设的热潮。休宁范氏也建祠祭祖，制定族规。这一事例使我们看到，明代政治文化通过如祠庙祭祖、乡约与宗族的结合，从而使宗族组织化并普及社会。¹⁶⁷

上述徽州的事例出自两个宗族，下面再看浙江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的个案。该族族谱中保留了丰富的风俗变化和宗族建设的资料，这两个内容出现在同一族谱决不是偶然的。研究表明，明

¹⁶⁴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¹⁶⁵陈宝良《晚明社会生活的新动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9期；陈宝良《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陈宝良《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福建论坛》2006年第3期。

¹⁶⁶邱仲麟《从禁例屡申看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过程》，载《淡江史学》第4期，1992年，第67-88页；吴启琳《〈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见成弘时期“奢靡”之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¹⁶⁷常建华《16世纪初的徽州宗族与习俗——以〈新安毕氏族谱〉为例》，《东吴历史学报》第十九期，2008年7月出版，第1-26页；常建华《习俗与教化：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以休宁范氏为中心》，《年鉴：历史学，社会科学》（法国·巴黎）2007年第1期。第1317-1375页。

嘉靖万历时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¹⁶⁸

士大夫与地方官联手整饬风俗、推行乡约教化导致宗族组织化的事例，在北方同样存在。如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古老的晋氏宗族在明代中后期组织化，成为当地望族。经商致富导致该族接受教育从事科举考试并产生了士大夫，这些士大夫秉承宋儒张载、朱熹有关宗族建设与移风易俗的主张，按照明朝的礼仪要求，修族谱、建祠堂、立族规，使得宗族组织化。洪洞晋氏是一个将士大夫特性与商业性合为一体的宗族，万历时期白银货币流行、商品经济活跃，洪洞地方与外界的联系性较强，社会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白银作为“礼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洪洞晋氏宗族的商业性与洪洞地方社会经济的现实一致。洪洞晋氏的士大夫特性，又决定了其宗族组织化是以当地万历初年推行乡约教化移风易俗为背景的，宗族组织化也可以说是宗族乡约化。洪洞晋氏的宗族组织化与移风易俗活动，反映了居乡士大夫的特性，显示出宗族的自治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洪洞晋氏明清时期书写的宗族历史，与同时代南方地区宗族组织化的历史变化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反映了共同经历的历史变迁。¹⁶⁹

清朝非常重视移风易俗活动，整饬士习是重要内容。清朝巡抚、学政等官员有整饬士习、振兴文风的职责，皇帝要求他们以奏折报告有关生童岁试、录取举人乡试的情形，乾隆朝奏折保留了这方面的资料。清朝把科举考试中整饬士习、振兴文风作为移风易俗看待，乾隆帝对此尤为强调，旨在将科举考试以及士子的行为纳入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¹⁷⁰

在我看来，明清时期移风易俗备受重视，绅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催生了宗族社会组织的产生与普及，也感到明清两朝国家儒化的特性。以往讨论移风易俗多作为维护国家统治需要来看，近年来政治学兴起的“治理”理论认为，“统治”意味着国家通过正式的代理人和体制实现强迫控制。而“治理”是国家权威和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它包含了不仅满足统治者而且因应村民需求的一系列内生性制度安排。它也是一个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体。有学者详尽描绘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乡村的非正式制度的实际运行¹⁷¹。明清时期移风易俗活动，或许可以使用“治理”的理论来审视，对既有的研究有所超越。

七、余论

在学习前辈与时贤的上述各种研究成果之后，把自己对于今后开展研究的三点感想汇报如下：

使用“新概念”。概念是认识事物、解析史料必不可少的。中国传统文献一向重视风俗记载，明清以风俗为表象的社会研究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社会风气”、“奢靡”如果作为分析工具看待的话，都开创了研究的新局面。后继者又从社会的角度提出“士绅社会”、“消费革命”、“消

¹⁶⁸常建华《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8年第4期，页60-70。

¹⁶⁹常建华《明清時代における華北地域の宗族の組織化について——山西洪洞晋氏を例として》，刊于《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5号，2006年11月，第15-40页。

¹⁷⁰常建华《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为中心》，《史林》（上海）2008年第2期。

¹⁷¹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

费社会”、“文艺社会”（或“文人社会”）、“城市社会”、“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等概念，从文化的角度使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等概念，有效地推进了研究，提升了认识水平。不可否认，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总起来说，“事实”是需要通过“概念”去认识的，最终需要回答社会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历史又是什么。我们的时代，信息化、收藏热、个性消费、旅游盛行成为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社会风气在变，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足令我们反观历史。新时代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理论新方法。近一二十年，社会史研究发生着“文化转向”，明清风俗的讨论也颇具社会文化史的色彩，特别是台湾学者有关“消费社会”、“文艺社会”以及“物质文化”的研究，在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尝试，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成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不过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新社会史。以人类学为基础的文化学，正在并将继续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概念”，或许成为对社会史影响最大的理论方法来源。

挖掘“新资料”。明清时期社会风俗的记载，大量的资料来自于方志、笔记与文集，以往的研究主要使用这方面的资料。地方志综合记载地方的历史与地理，注意社会风气的变化，反映出风气变化的阶段性与风俗事项，自然是研究风俗的基本资料。笔记小说中记载社会风气变化的感受，遍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近年来在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运用上，更加活用，用以描述各色人等以及生活细节。文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无论是其中的奏疏告示、判牍文移还是传志碑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资料范围还可扩大，有一些很好的实践，如档案资料反映的社会风气与官员生活资料也不少，契约文书多有民众生活记录，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绘画以及艺术品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运用，别开生面，引人注目。我自己挖掘到的珍贵资料：《毕氏族谱》有《陈俗》一篇，长 11000 字；《余姚江南徐氏宗谱》有《援古证今》一篇，长 1800 多字，都详细记载风俗变化，说明族谱是研究风俗的重要资料。事实上，其它各类型的资料如官方明清实录、政书以及民间各种文献或物质遗存，都需要人们去发现其史料价值。

处理“跨世纪”。在明清史研究领域，明清改朝换代一直是重要研究领域，两个朝代的断裂性与连续性即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前引张春树、骆雪伦强调探讨 17 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文化和国家相互作用而爆发出的巨变。赵园则对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言论”、“话题”感兴趣，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在思想史具有重要性，而且她被当时时代氛围与士大夫的精神气质所吸引了。无独有偶，上述研究处理的都是从明朝崇祯到清朝康熙时期即以 17 世纪为主的历史，无疑会论述到与 16 世纪明代的关系。就明清时期风俗的研究而言，主要肇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人们注意到 16 世纪的社会风气的变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探讨。16 世纪社会风气的研究，属于明史研究的范围。长期研究“明清之际”的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进一步扩展时间纵深特别是空间范围，认为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现在似应加强从世界的联系性讨论问题，即进入“16 世纪问题”的研究，“16 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亦即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本时期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为‘16 世纪问题’。”¹⁷²如果我们把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作为 16 世纪的诸多问题之一，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解释。岸本美绪提出的“后 16 世纪”问题，对于原有的清史研究更具挑战性。她所论述的“近世国家”面临的三大问题：民族、宗教，社会编制，市场经济与财政。如与清代“风俗”结合起来讨论，相信会给清代风俗研究带来新气象。毋庸置疑，“16 世纪问题”与“后

¹⁷²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16 世纪问题”不能割裂开来，两者本来就有前后的承继关系。都需要联系与比较的区域史和全球化视野，需要多学科的参与讨论。岸本教授前引论文结尾说：“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后 16 世纪问题’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即是怎样处理国内族群来建设既安定又公平的国家？怎样调整国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怎样应付全球化经济而实现繁荣的国家经济？从这些观点来回顾后 16 世纪的世界，各个国家从试行错误中提炼出来的独自解答，仍然值得仔细玩味与认真研究。”经历了世纪交替的我们感受到这些问题了吗？或者大家会从当今面临的其它问题追寻历史，提出研究设想，明清史离我们或许并不遥远。

（2008 年 8 月 14 日初稿，2009 年 2 月 8 日补充）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Old Fields and New Vision: Study on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Dynasties
from the Views of Customs

Ch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s on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promote the study of social customs of the Ming-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the full studies on the social values after 16th century have induced the topic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Dynasties and the emerging research results after the 1980s. The study on the customs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can be carried on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Views of customs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as a method; The study of consumption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entering on the problem of luxury;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ews of customs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ustom properties and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Ming-Qing Dynasties; Occupational outlook and Views of customs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In future the research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using the "new concept", exploring "th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ealing with "trans-century".

Key Words: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ustoms Social values Social history 16th century